

# 听一听儿童文学的脚步声

□刘绪源

## 新加盟的生力军

2015年儿童文学的实绩,有一部分是由新加盟的成人文学作家完成的。小说家马原拿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童话《湾格花原》;散文家赵丽宏继《童年河》后,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少年小说《渔童》;虹影在写出《奥当女孩》后,奉献了新书《里娅传奇》;张伟在《半岛哈里哈气》和《少年与海》之后,创作了第三部少年小说《寻找鱼王》;阿来也写出了他的少年题材中篇小说《三只虫草》……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艺术上也最成熟的,我以为是《寻找鱼王》和《三只虫草》。



张伟的前两部作品似乎还未找准儿童文学脉搏,不是描写密度过高,就是立意太过虚玄。《寻找鱼王》一改过去的节奏,写得简洁、明晰、丰满又耐人寻味。故事很有传奇性,写的是高山上的捕鱼人,高山缺水少鱼,捕鱼成了稀罕的职业。这里捕鱼分“旱手”和“水手”,前者大多不会游泳,擅长在没有水的地方找鱼;后者则生活在水边,到了旱季就束手无策。小说中的男孩先后拜两位年近80的“鱼王”为师,这一男一女、“旱”“水”的师傅本是一对恋人,后来成了仇家,他们的人生波折都与无处不在的“族长”有关。那“旱手”是一位悲苦的哲人,一生都在逃避和避世,也一辈子在思考和反思。他并不急于教孩子捕鱼技术,却在临终前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传授给他。“水手”是一位多情女子,她对旱手的爱始终不渝,一生都在悄悄地保护和等待(当然也在怨恨)。小说最后暗示我们:真正的鱼王应是强大无比的自天之力,世上万物都须以大自然的平衡为王,不然,无论什么“族长”或人间的“鱼王”都将遭致毁灭。这是一部内涵深邃的小说,同时又是很好看的作品,它在人物描写和探讨宇宙人生上的深度,在以往儿童文学中是少见的。

阿来的《三只虫草》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博大的气象和清新的气息。小说由一位优秀的、几乎有点天才的藏区儿童的“逃课”开场,可谓别出心裁。这是个充满孩子气又有旺盛求知欲的少年,但又一直惦记着家中的困难:奶奶买药缺钱,姐姐买衣服也缺钱。他早就想好了,到放假“虫草假”时要好好挖虫草,要赚两千块,一千给奶奶买药,一千给姐姐买衣服。当学校忽然通知今年不放虫草假时,他发现所有计划都要泡汤,这才逃学。他第一天独自上山就挖到15只虫草,回家分成两份,7只是奶奶的,7只是姐姐的,还多一只他留给自己,后来想想,又从上面两份中各抽一只,给自己留了三只虫草。他不断盘算它们的用处:要给关在狱中的表哥买一副手套,要给他最喜欢的两位老师买剃须泡和洗发水……这部小说的动人之处,就是小主角的这份拳拳之心。后来,虫草季正式开启,他们家大获丰收。但干部和喇嘛不断来抽头,他自留的三只虫草也很不甘心地交出去了。县里的调研员答应送他一套百科全书,从此,他的心全系在百科全书上。他对书的向往令人心酸,也让人心酸。他最后还是没拿到这套书。小说在实写他心灵历程的同时,虚写了官场的腐败,以讽刺笔调勾勒了虫草的“官场旅行记”。这部作品保持了阿来一贯的诗意风格,在他的创作系列中无疑也属上乘。

事实证明,儿童文学并不好写。一个成熟的成人文学作家,需要掌握儿童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才能在这一领域自由驰骋;但同时,他们还须拿出自己的最好作品,才可能在这一领域获得成功。那种认为既是为儿童写作就不须太过费力,拿出几成力气就行的看法,只能说是一种无知的误解。

## 抗战题材的长篇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很多出版社推出了抗战题材的长篇系列。但长篇创作很不容易,系列性专题性的组稿,往往难出精品。所以,真正成功的作品,大抵都在系列之外,并且都是早有酝酿、很个人化的创作。

这一题材中最成功的,我以为是史雷的《将军胡同》。这部作品浑然天成,气象高远。写的是抗战时期北京城里皮影戏班子的父女,前清八旗的落魄子弟,富有但爱国的姥爷一家,从这三个家族的

命运,透视了沦陷区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情感和遭遇,展示了那一特殊年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八旗后代图将军,他是个混混,什么生计都不会;但也是高水平的玩家,孩子们喜欢的他都会,且玩得极精。他卖光了家产,不得不去拉车;但他身上的义气、侠气、爱国精神在那个灰暗时期显得特别感人。他最后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死得很偶然,也极不明智,但将其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立得起来的“典型”,当下创作中如此丰满的典型人物已不多见。小说充满了“京味儿”,作品以儿童视角展开,姥爷家的孩子“我”与戏班出身的少女秀儿,都童心满满,因他们和图将军的交往,使作品妙趣横生,使这一重大历史题材成了真正的儿童文学。看得出这是一部长期积累的作品,有自己特殊的厚度,不可能是应命的急就章。

另一部有个性的成功之作是曹文轩的《火印》。作者强调,战争只是小说的题材,他所经营的是艺术品。又说,他追求的是一个好故事,小说的前身就是故事,小说不能没有故事。但我以为,以人物性格交织成的故事和以悬念巧合编织成的故事,不是一回事。《火印》是前者,此书人物塑造的成就远胜故事性之上。写得好的除那匹良马雪儿和主人坡娃外,日本军官河野和小日本兵稻叶也都相当丰满,并真实可信——这是本书重要的文学贡献。河野是在北海道牧场长大的,是一个有文化的军官,也是养马的专家,他不愿看到日本军队滥杀无辜,也反对虐马,所以一再阻止日本兵射杀抢夺雪儿的坡娃;但他毕竟是法西斯军队的一员,正是他下令罚坡娃父亲一个月苦役,将坡娃关在边上天天看他父亲受苦;在雪儿逃走后,又要烧掉村里所有房子,唯独留下坡娃家的;最后,在战事紧张时,也是他下令轰毁整个村庄。稻叶则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兵,他热爱生命,同情各种小动物,对雪儿生出的小马驹百般照顾,以至小马驹认准了他是自己唯一的主人,为了寻找走失的马驹,他死在中国军队的枪下。这些人物的个性和复杂境遇,是以前战争题材小说中很少见的。这样由故事凸显复杂人物,由复杂人物牵出深层的思考,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之义。只是,书中的马写得过于神奇,也太通人性了,这与强调故事而不是更强调写实,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刘耀辉的《布伦迪巴》不是小说,而是一则童话故事和一篇散文的组合,在同类题材出版物中最独特的一种。《布伦迪巴》本是上世纪30年代捷克儿童歌曲,成稿后仅几个月,德军就入侵了。作者是犹太人,很快被关进了捷克最大的集中营。不料,在这个通往灭绝营的中转站里,德国法西斯要制造一种自由的假象,让那里的艺术家们为犹太孩子办美术班、音乐班,这部儿童剧正是在这样一种奇异的环境中排练并演出的。无论是音乐家、小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随时都会遭到杀害,但他们依然演得那么认真投入。在惨绝人寰的年代里,居然有那么执著的视生死于度外的艺术家,一丝不苟地教儿童绘画,给儿童排戏,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人类文明的传承常常就是九死一生的,作为艺术家,他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丝传承的机会,他们已把这看成神圣的天职。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艺术态度宣告:刺刀可以夺去生命,却不能夺去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艺术所表达的是内心的自由,它不受刺刀玷污。刘耀辉将当年的歌曲改写成童话,又将这童话的来龙去脉及70多年来有关法西斯、有关艺术、有关儿童的史料及感想写成精彩的长散文,这新颖的编撰方式,也是为传承人类的文明。

## 新人走向成熟

读近年的儿童文学,最让人感到欣喜的,是一群30多岁的年轻作家迅速走向成熟。他们有生

活、有个性、有才华,创作力极其旺盛。其中几位已成长为令文坛瞩目的一流作家,例如汤汤、小河丁丁、舒辉波和顾抒。



2015年,汤汤完成了她的“土豆系列”,包含十多部独立成篇的长短童话,如《美人树》《愤怒小龙》《妖妖喀喀莎》。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入这组作品,但都转化成童话,这无疑是个独特的尝试。此外,她还出版了两本童话新著《伊回回来》和《守护神一个》,这是她的《喜地的牙》的延伸,写的是其中的双胞胎弟弟欢天和喜地的故事,在艺术上更成熟,读来轻灵有味。《天上的水》也是“土豆系列”中的一篇,巧妙地透露了童话创作的奥秘。作品写了土豆的一个疑惑:为什么那些还没长大的娃娃,尤其是还不会说话和走路的,都爱往天上看,还常常开心地笑?老人们说,小娃娃能看到天上的神仙,长大了就看不到了。土豆爱孩子,常常抱着那个叫“小米”的孩子,她顺着孩子的眼光用灯盯着天上看,竟真的隐隐看到一个倒挂在云端的小神仙。原来小米长不大是因为小神仙的恶作剧,土豆干预了神仙世界的事,让小米变成了正常孩子。婴幼儿看到神仙,可视为一种象征:因为这一阶段的孩子,大人们真的不了解的,童话作家只有像土豆那样顺着孩子的眼光努力去看,才会有接通童年梦幻的希望。当然也有人再用力也看不到,写童话不能力胜于才,还得靠各自的造化。

小河丁丁写得最好的是短篇小说,也包括带童话色彩的幻想小说。他在《爱喝糊粮酒的倔老头》之后,自觉地延着这种醇厚、幽深、世俗而又高雅的风格向前发展。《田螺手链》写的是幼儿,是两个被大孩子们看不起的五六岁的爱哭的孩子,作者对他们寄以无限同情,描写真切细腻,“我”与小女孩间的情谊写得很迷人,写出了人生的不圆满。《命》的时间跨度很大,几乎每10年一跳跃,作者写得从容平静,转折处都自然有味;所写的是三位盲人及其家人的心理和命运,充满真实的人生质感。盲人以“算命”为生,那个盲人孩子从小就想弄清“命”是什么,作品最后写道:“那个寻觅太久的答案就在心中若隐若现,想说又说不出,而且也不必说。给人说命好比给盲人说颜色,说的是一回事,听的又是一回事。”这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就是说,即使能知道命运,这“知道”和实际的人生体验,并不是一回事。这很耐咀嚼,但更耐咀嚼的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和人物关系,那几位命运很不好的人,他们的生活里有一种让人一谈起来就会鼻酸的特别的美——对这种古老民间的凡俗的美的发掘,是小河丁丁最重要的文学特色。

舒辉波的长篇小说《飞越天使街》是一部直面人生的有力之作,但不是新闻式写作,作者是将人生的酸甜苦辣都纳入心胸,沉浸于文学的波涛之中,然后才以饱满的真情铺展故事。2015年他除了出版一本短篇集《你听我说》外,新作不多。据说他正在追踪几位10年前采访过的底层少年,要写一组总题为《梦想是生命里的光》的纪实作品,也许不久就可陆续面世,我们翘首以待。

回首2015年的儿童文学,最该祝贺的还是顾抒。这一年,她先后完成了幻想小说《森林里的森森和森林》《布诺坐上公交车走了》《草籽之歌》;她的短篇集《蓝花井的咕咚》出版了,短篇小说《圈》还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布诺坐上公交车走了》是顾抒迄今为止最见分量的作品,在这扑朔迷离的故事中,布诺的形象十分奇特,他如影随形,什么都知道,“我”的一切都要跟他商量,读到最后,才令人惊惧地发现,这不是真人,只是从小就存在于“我”心中的一个谈话对象;“我”的爸爸是“调度员”,调度什么?作者没说,但读到最后又会惊觉,他不就是公交车调度员吗?他工作忙,故事讲得不耐烦了,就以“某某坐上公交车走了”匆匆作结,小时听多了这种结尾,长大的孩子早已忘却,但这结尾方式已进入孩子的潜意识,所以她无论讲谁的故事到最后都是“坐上公交车走了”。作者只顾半真半假地说个没完,说得好玩极了,读者一边听,一边想,心中就有了丰满的多层次的故事。这故事中,“我”童年的孤独和父亲身不由己的悲剧命运影影绰绰,足以让人泪下。作者很明显地受了于尔克·舒比格的影响,但主要学他那东拉西扯、半真半假的叙述方式,作品内涵则完全是自己的。《草籽之歌》写一

个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打人和被打的都是女生),不敢对父母和老师说破真相,在绝望中遇见一个奇怪的小男生,多次给她以启示,还在她差点陷于偷盗时阻止了她,她终于坚强起来,不再逆来顺受,但后来发现这小男生并不存在,那只是她心中的意象吗?这也是幻想小说,也有点扑朔迷离,但我阅读时竟至于泪流满面。在作者这些幻想中分明都有着结实的人生的质感。

2015年之前,顾抒曾对自己作品的“单薄”有过认真的反思,并力求突破。上述的两篇新作,已经不算单薄了——这里有一些值得总结的东西。其实,她所说的这种单薄,在幻想类作品中是很难避免的,即使村上春树的成功之作,也有人觉得“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我想这感觉是切实的。幻想再巧妙,终究是虚设的,不可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以真实密集的细节推出人生的厚度。但幻想小说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要想不单薄,只有在“现实”这部分加重加厚;同时,在幻想中,也注入更多现实的底蕴。顾抒的成功突破,奥妙正在于此。

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两位勤奋的青年作家——陈诗哥和孙玉虎。他们都是舒比格的爱好者,也都擅写幻想类作品。陈诗哥到现在为止所表现出的主要是诗的天赋而不是小说的天赋,所以在童话创作中,所写的几乎都是“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周作人语)的作品,与舒比格则更形相似。2015年他出版了《风居住的街道》和《故事马上开始》两本集子,其中的作品每一篇都好,但放在一起,难免有一种单调感。这其实是“单薄”的另一种体现。他的有些篇幅较长结构较复杂的作品,更适合高年龄的孩子读,我以为就不应再局限于“没有意思”,而应像顾抒那样写得“有意味而有意思”才好。对陈诗哥,我的建议是从舒比格的氛围中走出来,走向更大的幻想和文学的天地,还应把自己切切实实的人生体验也置入童话中去,这样才能写出厚重的新作。

孙玉虎在2015年有两篇令人瞩目的作品:《遇见空空如也》和《上上下下》。前者充满奇异的想象,写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少年在突如其来的困境中努力脱险,不断失败,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帮助下才得到成功。他写的也是一种内心的被困,但整个作品都是在虚设的幻象中展示各种挣脱过程,于是就有“单薄”感。后者是人与电梯之间的情感交往,也充满想象力,但这里有了更多的现实生活的底蕴,切实感人的内涵大大增加,读来就不再感到单薄。前者只是好玩,后者则能给人以美,因其更有真情实感的支撑。

## “真生命”与结构问题

2015年1月,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谢倩霓的“薄荷香”系列:《一个人的花园》《总有一朵微笑》《一路遇见你》。这是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长篇,写学龄前与初入学时、小学二三年级及五年级的生活。作品充满童年趣味和生活气息,虽然没有完整的故事,拿起来却放不下,且回味无穷。按理说,如像秦文君“小香咕”系列那样有个总体的悬念,作品将更好读。但谢倩霓说,这些素材在设计中酝酿太久,对于她太珍贵了,她怕外在情节的设计会破坏心中的美感。这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品结构之难,往往发生在确有“真生命”的作品中;那些不具备多少真生命的编造之作,构想一个完好结构反倒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2015年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选中,我有幸参加复评,读了20部中长篇,对上述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体验。可以说,在儿童文学的中长篇中,不重视结构,草率对待总体布局,甚至写到哪算哪的问题已相当普遍和严重。这与出手太快、作品出版太容易、编辑不对作品把关是有关系的。虽然结构在作品中并不是第一位的文学要素,但有时结构上的长短的确影响着作品的质量。这里试

“2015年儿童文学的实绩,有一部分是由新加盟的成人文学作家完成的。儿童文学并不好写,一个成熟的成人文学作家需要掌握儿童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才能在这一领域自由驰骋;但同时,他们还须拿出自己的最好作品,才能在这一领域获得成功。”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很多出版社推出了抗战题材的长篇系列。但真正成功的作品,大抵都在系列之外,并且都是早有酝酿、很个人化的创作。

儿童文学的中长篇不重视结构,草率对待总体布局,甚至写到哪算哪的问题已相当普遍和严重。这与出手太快、作品出版太容易、编辑不对作品把关是有关系的。虽然结构在作品中并不是第一位的文学要素,但有时结构上的长短的确影响着作品的质量。

举两部优秀的小长篇,作一对照。

韩青辰的《小证人》与彭学军的《浮桥边的汤木》,前者荣获这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后者虽未获奖但在复评时高票通过并得到评委们盛赞。在结构上,前者较为沉重缓慢,但内容更厚实;后者轻灵可读,悬念强烈,厚重感则稍逊。两本书都是有“真生命”的,都调动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前者可能酝酿更久,内心的投入更多,但也因此屡做加法,颇添负重。在写法上,作者钟情于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的笔法,从容描摹,力图展示更广阔的人生场景。但托尔斯泰在写《复活》和写《高加索的俘虏》时,笔下的密度和进展速度完全不同,更不用说他那些写给低龄儿童看的《启蒙读本》《俄罗斯读物》了。鲁迅也强调为儿童写作要“浅显而且有趣”,他在翻译上坚持“直译”,译本大多艰涩,但为儿童翻译的《表》却轻灵明快,极为可读。可见,即使是那样的大家,为儿童写作时也是要换一副笔墨的。《小证人》如能在结构上巧作剪裁,笔墨再快捷灵动些,一定能吸引更多小读者。《浮桥边的汤木》有一个很抓人的开头:10岁的汤木偶然听到了别人要杀害他的计划,他如说出去父母也将被害,而时间只剩3周。作品写了在这仅剩的21天里男孩的变化,写得惊心动魄,也顺理成章,写出了男孩的成长,这一过程是有结实的生活细节支撑的。这让人想到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很能引发读者对生命的珍惜。而谜团解开竟是一场误会,这后面的情节显然压不住前面悬念的烈度;反过来,通俗剧式的悬念也会干扰读者对成长过程的体验,让人只关心最后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开头“听见”的场面还不如不正面写,只写那男孩当天归来魂不守舍,此后言行变得非常奇怪,但却迅速成长成熟起来,直到最后,才揭出他曾经听到过一段对话。美学上“期待大于惊讶”的原理,正可用在这里。这两部作品,其实可相互借鉴,各取对方所长,这至少有益于今后的创作吧。

韩青辰和彭学军在结构上都是用心的,是下了功夫的。这也印证结构之难。但有更多作品,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的结构问题,却在于下功夫不够。比如多次获奖、也荣获本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少年的荣耀》,结构上前重后轻,前面花很多笔墨写了父母和老家,后面干脆放弃不写了,最后一章也匆匆收场,显得不够匀称。舒辉波的《飞越天使街》前半部分分量极重的“母亲”到后半也不再出现,未能完整照应全篇。牧铃的长篇《忠犬的背叛》故事性极强,但此书前半是第三人称叙事,从中间开始,又变成第一人称了。看来,要重视结构,这在儿童文学界和童书出版界,已到了需要大声呼吁的时候了。

还有另一种关于结构的情况,我是从另一部荣获本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长篇《血驹》想到的。作者黑鹤是当下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像西顿那样的世界一流的动物小说家的,但他的作品结构出现了自我重复,总是写某一动物奇特的出身和艰难的幼年,中间常有一段被迫远离家乡,最后则多是奇特的死。而西顿的作品却少有重复,这就是差距。要突破自己长篇结构的套路殊非易事,连屠格涅夫也未能解决好。建议黑鹤狠下决心,在今后几年中力避上述三大场景,对突破瓶颈及未来的巨大发展,这却是不可少的过程。

## 封面欣赏



悟空,乖! 向华/文 马玉/图 连环画出版社,2012年11月

儿童文学 李沂 日论